

# “远信难寄”:曾国藩京官时期家庭通信效率研究<sup>\*</sup>

时磊 范伟杰 杨德才

**内容提要:**通信效率是理解组织信息交互能力,进而理解社会组织和国家治理的重要钥匙。学界已有部分传统社会民间通信研究,但较少评估通信效率。传统社会民间通信方式主要是附书代递、顺路捎带和专人投递,传递内容更多是家庭安信。本文通过汇聚《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日记》和《曾氏三代家书》,系统梳理曾国藩京官时期家庭通信状况,利用信件丢失率和发出-收到时间评估传统时代民间通信效率。研究发现,曾国藩京官时期最初信件丢失率较高,后期不断下降,原因是北京到长沙采用附书代递,长沙到家采用家人家仆专递;通信时间回归结果显示,随曾国藩进京时间推移,更熟练使用附书代递、家人家仆专递,曾氏家庭通信效率提高;发信-收信地处于城市通信效率更高;附书代递效率高于顺路捎带。传统社会民间通信效率低可能源于频率低、城市化程度不高和不能接近附书代递系统等。

**关键词:**通信效率 曾国藩 家庭通信

## 一、引言

人类社会是按照某种方式将诸多要素相互联系起来的系统,系统中信息交互是非常重要的。杜杏叶认为,信息熵的存在,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的信息素质不同,使得发出信息和接收信息之间必然存在差异,因此需要通过信息交互矫正信息差异。<sup>①</sup>而通信效率是理解组织信息交互能力,进而理解社会组织和国家治理的重要钥匙。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大有言:“信息流动对人类社会而言,如同血液之于躯体。”信息有序流动需借助一定的媒介或技术,而通信则是服务于人的信息表达、存储和传送的技术,<sup>②</sup>通信效率对人类社会如同血液循环效率。本文试图评估传统社会的民间远距离通信效率,与本文相关,现有文献侧重邮政、驿站和通信的历史研究,例如刘广生<sup>③</sup>、马楚坚<sup>④</sup>等,这些研究一方面对邮政、驿站和通信的历史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另一方面夹叙夹议,提供了一些观点和论证,但并未涉及通信效率评估。此外,这些研究偏重政府公文、军事系统的通信研究,民间通信较少涉及,这可能源于资料可得性差。而以民间通信为主可能是现代邮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北京市邮政局史志办公室指出了古代邮驿和现代邮政的区别,“古之邮驿,均仅供官军之用,普通人民不得享受,民信局虽可供人民享受,惟为商民所营,属于私邮,非国家邮政可比也。”<sup>⑤</sup>

[作者简介] 时磊,扬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扬州,225127。范伟杰,扬州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扬州,225127。杨德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京,210093。

\* 本文部分内容为国家社科基金“供给体系质量提升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途径研究”(批准号:18BJL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对扬州大学商学院“青年教师学术沙龙”和“微观·计量 workshop”参与老师和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① 杜杏叶:《信息传递的交互性在社会组织信息构建中的作用》,《现代情报》2005年第7期。

② 转引自赵泓、肖雪龙:《通信革命的力量——评〈中国通信图史〉》,《中国编辑》2010年第4期。

③ 刘广生主编:《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版。

④ 马楚坚:《中国古代的邮驿》,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⑤ 北京市邮政局史志办公室编:《北京邮政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传统社会通信方式主要有两种:大鼓、烽燧为主的早期声光通信;步行、传车为主的邮传通信。但传统声光通信主要用于军事系统,传输效率高但内容简单,仅有2个比特。传统社会的邮传通信,传递方式有两种:一是派遣专使递送;一是多人接力递送。<sup>①</sup>中国古代邮驿系统起源于殷商时代,在甲骨文中已有记载,兴盛于周朝,到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比较普遍了。孔子说过:“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sup>②</sup>但初期的邮驿,是政府专用的通信组织,只传官书,不传民信。民间通信由个人负责,发展十分缓慢。直到北宋景祐三年(1036),宋仁宗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后世沿用这一办法,但能够附递的,仍限于宦宦士绅。<sup>③</sup>宦宦士绅信件过多会拥堵邮驿系统导致运行效率大幅下降,甚至影响公文系统运行,因此,清代禁止私人书信使用官府印封,或交由驿站传递。《清会典事例》卷118载:嘉庆五年(1800)上谕,“近闻各省积习相沿,无论公文紧要与否,概由驿递,即通问私书,属员贺禀,均用印封交驿,甚至有由六百里加紧加快驰送者,以至各驿站每日急递公文,多至数百件。”“嗣后督抚大吏,务当先自检点……不得滥填五六百里。至私书贺禀,均不准擅用印封驿马。”尽管三令五申,很多官员仍置若罔闻,“私书”仍滥用官方封套,交驿传递,或交折差赉送,甚至交提塘代送。<sup>④</sup>

除附书代递外,传统社会民间通信常常依赖专人投递和顺路捎带,并未形成系统邮政机构和专业邮差。专人投递成本高昂,往往局限于短距离、重要事项通信;长距离通信可能更依赖顺路捎带,但需要合适的时机,容易发生遗失,通信时间也往往较长。<sup>⑤</sup>明清时期民间还建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通信组织,多称信局,较为重要的可能有:民信局、侨批局、“麻乡约”和“信客”等。<sup>⑥</sup>但这些通信组织往往是地区性的,机构分散、本小利微,无法形成统一的通信网络,缺乏规模效应必然使得这种通信活动无法覆盖更大的范围,而且资料也较为缺乏。以本文系统整理的曾国藩家庭通信为例,只有一封似乎是通过民间通信组织全程传递的,因此本文主要基于附书代递、顺路捎带和专人投递等评估传统社会民间远距离通信效率。评估传统社会民间远距离通信效率需要两个条件:第一,需要有大量、频繁的信件往来,单纯个案或小样本不足以评价整个体系的通信效率;第二,这些信件能保存下来,成为重要史料来源。传统社会民间远距离通信主要是由士绅阶层的家庭家族内部完成的,主要是家庭安信,这一点下文将仔细论述。综合这些条件,曾国藩家庭通信可能是一个较好的样本。

目前只有彭凯翔对传统社会通信效率进行过评估。<sup>⑦</sup>彭凯翔分析了《山西票号史料》中1844年某票号京师分局向苏州分局所发71次通信的耗时分布,即在固定了发信地和收信地(北京和苏州)的前提下,发现普通通信集中在16—20天,比官方递送本章的14天4时的定例略高。这一研究与本研究的不同如下:第一,彭凯翔研究的是商业机构通信效率,票号是通过民信局进行通信,一封信脚价,从16到26两白银不等,这些信件往往是专人送达,提前到达脚钱还会增加,如果迟到就惩罚;本文评估的通信方式则包含了附书代递和顺路捎带。第二,彭凯翔研究的商业机构通信内容主要是市场价格等信息,时效性强,具有较大的经济利益激励,这可能比全社会通信效率均值要高,波动性更小;本文则主要是家庭安信。囿于史料可得性和研究目的,本文以《曾国藩家书》<sup>⑧</sup>、《曾国藩日记》<sup>⑨</sup>

① 姜希河总编:《中国邮政简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页。

② 《孟子·公孙丑上》。

③ 楼祖诒编著:《中国邮驿史料》,人民邮电出版社1958年版,第5页。

④ 转引自仇润喜、刘广生主编:《中国邮驿史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页。

⑤ 上古和中古时期民间通信的稀少,参阅刘广生主编:《中国古代邮驿史》,第361—365页。明清时代商贸繁荣后逐步建立起的会馆网络成为顺路捎带的重要依托,参阅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9页。

⑥ 姜希河总编:《中国邮政简史》,第33—36页。

⑦ 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第31—32页。

⑧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岳麓书社2015年版。

⑨ 唐浩明编:《曾国藩日记》,岳麓书社2015年版。

和《曾氏三代家书》<sup>①</sup>为核心史料,汇聚了京官时期的曾国藩家庭通信,从信件丢失率和发出—收到时间两个角度系统评估通信效率及其演变。比较现有文献,本文从两个角度评估民间远距离通信效率,对现有古代通信研究是一个有益补充,同时本文也尝试从量化视角研究曾国藩,可能对曾国藩研究也是一个拓展。

本文以下结构为:第二部分是曾国藩京官时期家庭通信概况和整理;第三部分是曾国藩京官时期家庭通信传递方式和收发地点分析;第四部分是曾国藩京官时期家庭通信效率评估;第五部分是结论。

## 二、曾国藩京官时期家庭通信概况和整理

对曾国藩生平事迹的研究自晚清以来长盛不衰,成果汗牛充栋,这里简要加以回顾。曾国藩研究的第一阶段(1872—1948),侧重曾氏生平文献汇集整理、评价和辑录嘉言警句等;第二阶段(1949—1978),主要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第三个阶段(1979—至今),以研究的客观化、多层次化、深入化和多学科化为主要特征。第三阶段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对曾国藩的主张具体分析,而不是全盘否定或肯定,朱东安 1986 年的《曾国藩传》、<sup>②</sup>张宏杰 2018 年的《曾国藩传》<sup>③</sup>是最近代表;第二个层次是对曾国藩理学思想、洋务思想、家庭伦理和文学理论等的研究;<sup>④</sup>第三个层次以曾国藩为例,管窥晚清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主要研究有朱东安的曾国藩幕府研究、<sup>⑤</sup>张宏杰的曾国藩经济支出研究、<sup>⑥</sup>郭玉峰的曾国藩家族婚姻生育研究<sup>⑦</sup>等。

本文接续前述的曾国藩研究趋势,试图以京官时期曾氏家族通信为例,管窥清代乃至整个传统社会民间远距离通信效率。之所以将研究时期限定为“京官时期”是出于如下考虑:第一,曾氏离京后行程不定,对通信收信、发信地需要更多考证,而京官时期曾氏在北京居住地虽有变化但基本固定在南城附近,且除 1843 年<sup>⑧</sup>主考四川乡试,出过一次 4 个多月长差外,其余均生活在北京。第二,曾氏主要通信对象除个别情况外,均长期生活在湖南,收发信地虽有些许变动但基本可以归类为:省城、县城和家。第三,曾氏及其家族京官时期尝试了多种通信方式,通信次数多、频率高,信息冗余度高,可以多角度进行统计和分析。曾国藩京官时期的具体时间划分如下:起点,依据《曾国藩日记》,曾国藩 1839 年十一月初二起行进京,一路颠沛流离,直到 1840 年正月二十八,近三个月后抵达北京,开启其京官生涯。因此本文将 1839 年视作京官时期的起点,1840 年为第一年。据《曾国藩年谱(附事略 荣哀录)》,曾国藩京官时期确切的结束时间应是,1852 年六月二十四日,这一日曾国藩“驰驿出都”,奔赴江西乡试主考。<sup>⑨</sup>七月二十五日夜曾国藩的家信《论纪泽》称,当日丑正二刻(凌晨两点半),曾国藩在安徽省太湖县之小池驿接到母亲离世消息,<sup>⑩</sup>从此离开北京,直到 1868 年再未到过北京。

本文通过汇聚《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日记》和《曾氏三代家书》整理曾国藩京官时期的家庭通信收发记录。其中,评估信件丢失率的收发记录整理以《曾国藩家书》和《曾国藩日记》为核心,主要是以曾国藩的视角来看信件收发和丢失现象。《曾国藩家书》正文部分往往提及最近一段时间的收

①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 2002 年版。

② 朱东安:《曾国藩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③ 张宏杰:《曾国藩传》,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 年版。

④ 参见徐泰来:《全面评价曾国藩——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2 期。

⑤ 朱东安:《曾国藩幕府》,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⑥ 张宏杰:《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中华书局 2015 年版。

⑦ 郭玉峰:《“活”的人口史:从曾氏家族看 19 世纪中国官宦之家的婚姻、生育行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⑧ 本文采用公元纪年,日期仍采用传统农历,下文相同,不再一一说明。

⑨ 黎庶昌、王定安等:《曾国藩年谱(附事略 荣哀录)》,岳麓书社 2017 年版,第 21 页。

⑩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 206 页。

表 1

1839—1852年曾国藩家庭通信分年度数据统计表

单位:封

年份	收信	发信	合计	丢信或疑似丢信	发信最高编号	收信最高编号
1839	0	1	1			
1840	2	5	7			
1841	19	14	33	4	第 17 号	
1842	14	8	22		第 13 号	第 2 号
1843	7	5	12	6	第 5 号	第 3 号
1844	14	13	27	1	第 14 号	第 2 号
1845	16	5	21		第 17 号	第 9 号
1846	13	2	15		第 23 号	第 6 号
1847	11	17	28		第 9 号	第 9 号
1848	9	25	34	2	第 18 号	
1849	19	9	28	1	第 22 号	第 6 号
1850	2	5	7		第 5 号	
1851	13	15	28		第 16 号	第 8 号
1852	3	2	5			
合计	142	126	268	14		

资料来源:据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曾国藩日记》相关记载整理。

发信,这是本文整理的重心,例如 1841 年五月十八日写给父亲信中说:“男于闰月十六发第五号家信,四月十一发六号,十七发七号,不知家中均收到否?”<sup>①</sup>《曾国藩家书》中还有许多重要信息,主要是寄信方式、寄信人和寄信地点之类,而且很多时候会在多封信对同一信息进行充分确认,这有利于我们的校勘。例如,1840 年二月初九,曾国藩抵达北京后在《禀父母》中写道:“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汉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纸行,不知已收到否?”<sup>②</sup>1841 年四月十七《禀祖父》中写道:“澄候弟三月初四在县城发信已经收到,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sup>③</sup>由于时代久远,许多信件丢失,无法确认是通信过程丢失还是保存过程丢失,因此使用《曾国藩日记》对信息进行补充是必要的。例如 1840 年六月初十日日记写道:“接到家信,(小字)四月十五日发。”<sup>④</sup>日记也有很多其他信息,例如 1840 年六月十二日提到,“后写家信……之后朱嘯山来,托寄家信同去。”<sup>⑤</sup>而同年十一月初一提到“在会馆朱嘯山处早饭”,<sup>⑥</sup>可见朱嘯山主持会馆,上一封信由会馆寄出。而且 1839 年日记多次提到朱嘯山,并和其一起进京。对《曾国藩家书》和《曾国藩日记》整理,最终得到信件共有 268 封,年度分布如表 1。

评估通信效率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计算发出-收到时间(天数),但《曾国藩家书》和《曾国藩日记》中,能够明确追溯到发信日期和收信日期的只有 86 封,这些信都是从湖南寄到北京的,例如 1841 年六月廿九日《禀祖父》写道:“廿九日早接到丹阁十叔信,系正月廿八日发。”<sup>⑦</sup>由此可以计算通信时间,例如,丹阁叔的这封信走了 5 月零 1 天,我们将时间计为 151 天,这里为计算方便,忽略了农历大进小进<sup>⑧</sup>,对传统时代而言这个误差并不明显。为了弥补样本过小可能带来的问题,我们进一步整理

①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 4 页。

②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 1 页。

③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 3 页。

④ 唐浩明编:《曾国藩日记(一)》,第 39 页。

⑤ 唐浩明编:《曾国藩日记(一)》,第 39 页。

⑥ 唐浩明编:《曾国藩日记(一)》,第 45 页。

⑦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 6 页。

⑧ 农历一个月共 29 天半。为了算起来方便,我们将大月定做 30 天,小月 29 天。一年 12 个月中,大小月大体上交替排列。但规律并不是特别明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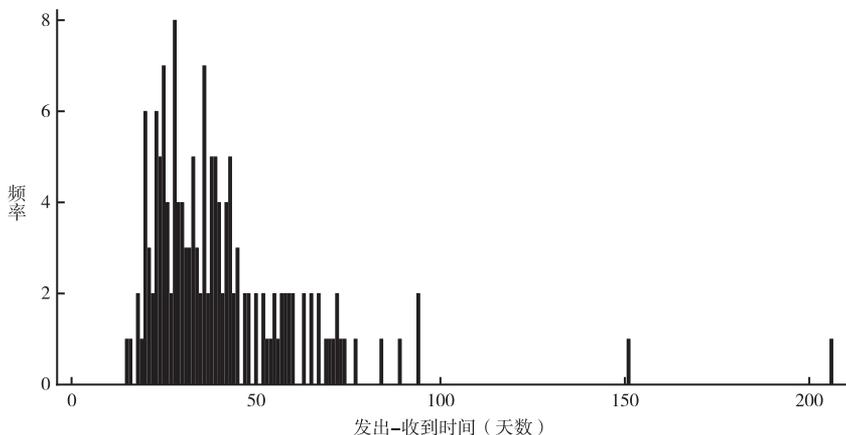


图1 曾国藩京官时期的家庭通信邮递通信时间分布频率图(全部)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来自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曾国藩日记(一)》以及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

了《曾氏三代家书》,得到从北京发往湖南能够追溯到收发信日期的信件66封,全部可以得到152封信,这使得我们可以进行统计和回归分析。《曾氏三代家书》中京官时期发信人过多,包含曾麟书家书、曾骥云家书、曾国潢家书、曾国华家书、曾国荃家书和曾国葆家书几个部分,很多信件可能重复,一一识别、校勘工作量较大且无益于本文研究。与本文主题相关处,可能会有所涉及,作为补充证据。曾国藩京官时期家庭通信时间分布频率如图1,我们做了统计分析,152封信件平均通信时间长度是41.25天,标准差是23.32天,最快的一封信只走了15天,最慢的一封走了206天。各个分位数的情况是,邮递时间第10分位数为22天,第25分位数为26.5天,中位数为36天,第75分位数为48天,第90分位数为67天,呈现略右偏分布。需要说明的是,《曾氏三代家书》整理出来的由北京寄往湖南的信件时间都较为靠后,最早的一封信是1848年的五月初十,而依据《曾国藩家书》和《曾国藩日记》整理的信件这个时间已经非常靠后了,如表1。由于湖南寄北京信件更具有代表性,尤其是包含了早期探索阶段,我们将之重新作图,放在图2中。比较而言,这个频率分布图更接近正态分布一些,虽然略右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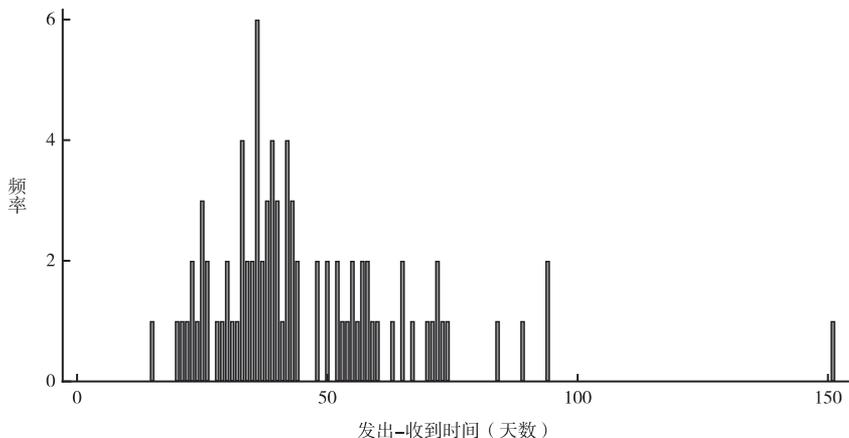


图2 曾国藩“京官时期”的家庭通信邮递通信时间分布频率图(湖南寄北京)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来自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曾国藩日记》。

### 三、曾国藩京官时期家庭通信传递方式与收发地点

#### (一) 传递方式

曾国藩家庭通信路程可以区分为:第一段是从家中到湘乡县城,第二段是由县城到省城长沙,第三段是由长沙到京城。最初第一段和第二段往往是分割的,而后期常常直接从家中到省城寄信或省城收到信后直接送家。长沙到北京之间初期探索了多种传递方式,最终慢慢收敛到附书代递,主要依赖折差、提塘等正规途径,而由长沙到家这一段起初也尝试了多种传递方式,最终逐步收敛到由家人、家仆专人传递。顺路捎带是持续始终的重要方式,而且主要是寄出物品时使用,信件往往只是附带的。由于这一时期时间跨度长,曾氏及其家庭地位变化较大,进而尝试了多种多样的信件传递方式,具有非常典型的时代代表性,这可以在同时代的许多文献中得到验证,如林则徐的日记和家书。<sup>①</sup>曾国藩京官时期初年通信方式可能更加靠近平民,后期通信方式更接近士绅阶层;我们猜测,虽然平民阶层人数更多但通信频率更低,更少写信,没有太多跨地区通信的需求,而士绅阶层虽然人数占比不高,<sup>②</sup>但主要通信活动是他们发起的,尤其是跨地区远距离通信。士绅阶层通信可能主要还是家族和家庭内部的,曾国藩就是一个典型。曾国藩生平最重要的挚友有刘蓉和郭嵩焘,依据笔者统计,1839—1852年间《曾国藩日记》仅记录了给刘蓉写信一次,郭嵩焘发出7封收到2封,当然曾氏日记有大量缺失。但刘蓉曾向曾国荃抱怨,三年未接曾国藩片纸。

我们首先整理次要的通信传递方式。上文提及,1840年二月初九,曾国藩写道:“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汉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纸行,不知已收到否?”<sup>③</sup>这是记录中唯一一封由商行发出的家信,可能需要辗转捎带。1840年,《曾国藩日记》写道:“六月十二日,写家信,之后朱嘯山来,托寄家信同去;六月十三日,写给诸弟信,晚上写寄物家信;六月十四日,派人送物和信到会馆。”<sup>④</sup>六月十四日发出的这封信可能是六月十三日写的,这是同一封信。这两封信很可能都是通过会馆寄出的,甚至这一时期曾国藩的家庭通信主要都是通过会馆寄出的,但我们目前缺乏更多的证据。吴慧指出,会馆主要是外来商人在某一经商地为联络乡谊、相互支持而设置的商人组织,有较浓厚的地域乡土色彩,但也具有行业性质的内涵,是行业性与地域性的“二重性”的统一。<sup>⑤</sup>值得注意的是,商行是湘潭的,距离湘乡仍然有一段距离,由此可见,当时的民间通信是非常曲折的,需要多次转手。1851年曾国潢在四月十三日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三月十五日在汴梁发信交天顺差局寄来,想已收到。”<sup>⑥</sup>这也是一种较为少见的通信机构或传递方式。我们推测,这是由于曾国潢回家途中不便使用正式渠道。1842年十月廿六日给父母信中提到,“萧辛五先生处寄信,不识靠得住否。”十月十七日写给诸弟信中提到,“十月廿七日寄弟书一封……已改寄萧莘五先生处,不由庄五爷公馆矣。”<sup>⑦</sup>据上下文推测,这应该是湘乡—长沙寄信处,公馆常常指的是仕宦富人的住宅,也可能是类似信局一类的机构,但没有更多证据。贡差和折差虽然同属附书代递,但贡差可能更罕见,曾国藩家族通信中仅有一次。1852年三月初八曾国荃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昨见贡差马见田(抚标把总),云日内解贡来京,可以寄信及

①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9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林则徐:《林则徐家书》,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年版。

② 士绅阶层人数大约有140万人,转引自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③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1页。

④ 唐浩明编:《曾国藩日记(一)》,第39页。

⑤ 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⑥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76页。

⑦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33页。

什物。……马君来宅稟见,望兄与之一见为荷。嗣后往来家信,可随便托他转致。”<sup>①</sup>三月十五日信中又说到:“初九日曾写第四号信,交贡差马见田带来。”<sup>②</sup>

由北京到长沙的部分可能主要依赖附书代递,最主要的形式是折差和提塘。折差是指当时专为地方大员送奏折到京城的邮差,也称为折弁,他们办公差的时候,顺便为在京城做官的人传递家信。这种方式既稳妥又快,为清时京官普遍采用。提塘主要是在京城和督抚之间传递军营文报、京报和部文等,提塘人选往往由各省推荐咨送兵部,由兵部统一管辖。<sup>③</sup>李章程提出,提塘分为“驻京提塘”和驻扎省会的“省塘”,“提塘之设,不过令其赍进本章、投领部文而已”。<sup>④</sup>提塘是一个专门传递政府公文系统,而折差很多时候是衔命进京,任务更单一些,但提塘属于正规系统,因而更可信,后文可以看到,曾国藩提到提塘可以“挂号”,后期可能两者合并管理。1841年曾国藩在北京开始通过折差发信,四月十七日写道:“四月十一日由折差发第六号家信,十六日折弁又到。”<sup>⑤</sup>其次,湖南家中也开始尝试通过折差发家信,不过并不是特别成功,主要方式是由县寄省城然后转折差,十月十九日信中写道:“八月十三日由县附信寄折差,皆未收到。”<sup>⑥</sup>1844年这种通信方式就打通了,从湖南寄送北京也使用了折差,1845年二月初一信中批评诸弟,“诸弟写信总云仓忙。六弟去年曾言城南寄信之难,每次至抚院赉奏厅打听云云,是何其蠢也!……何必打听折差行期而后动笔哉?或送至提塘,或送至岱云家,皆万无一失……”<sup>⑦</sup>六弟曾国华能熟门熟路打听折差行期,然后再写家信,由此可见使用之频繁。之后的年份中多次提到折差、提塘,甚至还有一次丢信查信风波,旷日持久,下文将加以详述。在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读书的曾国荃、曾国华和曾国葆兄弟多次提到折差,曾国藩也多次提及折差、提塘。

由长沙到家的这一段早期可能主要是通过顺路捎带、地方性机构和家人专递之类,后期则逐步集中到家人、家仆专人送达的方式。前文提到的由县寄折差就是一例,萧莘五(也写作萧辛五、萧新五)在曾氏家信中多次多人提及,可能是另一个重要的例子。从《曾氏三代家书》中可以看出这种方式发生了较为系统的变化,1848年六月初一曾麟书写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五月初十,陈岱云专人送尔第六号家信。”<sup>⑧</sup>1851年十一月,曾麟书在县城办理漕粮事务时发信两封,1852年四月初九、初十写了两封信,初十一早曾麟书派家人刘一晋省发信。之后在《曾氏三代家书》中多次提到派人到省城送信,在省城读书的曾氏兄弟接到信后派人送家。1852年六月廿日,曾麟书给曾国藩信中写道:“即日予已书信,着刘一送至省垣,托贺少庚寄进京,应可收到。”<sup>⑨</sup>1848年六月十二日,曾国潢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昨夜九弟到省,着一人回,接兄五月初十日信,欣悉一切,甚善。”<sup>⑩</sup>1849年,“三月初九寄来一封,着彭四送交陈岱兄家;六月初七信,端午节呈函,遣彭升晋省。”同年八月十七日曾国潢给曾国藩信中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两弟专使从省城回。”<sup>⑪</sup>曾国荃1848年八月十七日信中说:“十五日家中遣人来,接仲兄信。”<sup>⑫</sup>1852年四月十八日信中说:“顷家中又着刘一来。”<sup>⑬</sup>曾国葆家信中也

①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163页。

②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166页。

③ 刘文鹏:《清代提塘考》,《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④ 李章程:《清代提塘与公文传递》,《档案学通讯》2015年第3期。

⑤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3页。

⑥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13页。

⑦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93页。

⑧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1页。

⑨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24页。

⑩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32页。

⑪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66页。

⑫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136页。

⑬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169页。

有类似语句,篇幅限制,不一一列举。京官时期后期曾氏家族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和地方官员多有来往,人际交往圈也有所扩大,家庭经济状况改善也使得家庭成员经常去县城、省城采购物品,家中童仆多达二十余人,仆仆于道,诸弟也常常在县城、省城读书,因此这一段通信效率明显改善,渠道逐渐集中。家中到省城的通信方式逐渐收敛为家人家仆专递。

这一时期通信传递方式的重要补充是顺路捎带,包括同乡和同僚两种,由于区分难度较大,本文并未加以区分,早期可能主要是同乡,后期同僚渐多。1841年十一月十九日《稟祖父母》信写道:“十一月初二日,孙发家信第十五号,外小鞋四双,由宝庆武举唐君带到湘乡县城罗宅,大约新正可到。”<sup>①</sup>同年七月初九同乡彭山屹(字九峰)进京考武举,带来许多家信,此外,还有一封疑似丢失的信件是通过黄恕皆带出的。1842年二月十六号接到家信第一号,是正月初三日,交给彭山屹带到北京的。同年三月十九日发第三号信,交金竺虔带回的。1844年正月廿五日给父母信中提及,“男在四川,于十一月廿日还京。彼时无折弁回南,至十二月十六日始发家信,十二月除夕又发一信,交曾受恬。受恬名兴仁,善化丙子举人……”<sup>②</sup>1844年四月十七日第四号家信,交朱嘯山带回,冯树堂带第五号家信。1846年九月十九日信中总结时也有,“八月二十七日,周縵云处发第十五号信”,<sup>③</sup>第二年正月十七日信提及,“去年十二月十七发第廿二号信……交徐玉山太守带交萧辛五处,想三月可到。”<sup>④</sup>1849年三月初一由常德太守乔心农寄出第四号信;四月十四发第六号,由陈竹伯观察带交;五月二十四号,由广西主考孙藻田太史发第九号信;十月十七日发第十八号信,由廷芳宇明府带交,到省城,存陈岱云宅。<sup>⑤</sup>这些信的捎带主体多为官员。1850年三月十二日,发第四号信,交魏亚农;十月十二日诸弟信中提到,“十二夜又在陈伯符处接到父亲大人闰八月初七所发之信,系交罗罗山转寄者。”<sup>⑥</sup>《曾氏三代家书》由于处于京官时期后期,较少由顺路捎带邮寄信件,除了曾国华和曾国潢由北京返回途中因寄信不便存在一些。不再一一列举,有兴趣读者可自行查阅。<sup>⑦</sup>

## (二)收发地点

曾国藩入都初期寓居宣武门外南横街千佛庵(1840年正月二十八—四月),之后移寓淀园挂甲屯(1840年四月—六月),接着移寓果子巷万顺客店(1840年六月—十月),十月移寓达子营之关侯庙(1840年十月—十二月),十二月移寓棉花六条胡同路北(1840年十二月—1841年八月)。1841年八月移寓绳匠胡同北头路东,1844年三月二十四日移寓前门内碾儿胡同西头路北,1847(道光二十七年)年三月移寓南横街路北,至此再无搬家之举。<sup>⑧</sup>这些地点都在北京宣武门以南附近,彼此间距离数公里以内,可以视作一个较为固定的地点。<sup>⑨</sup>曾国藩京官时期家庭收发信地址主要分为几个层次:第一是省城湖南长沙,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就是陈源究(字岱云)家,曾氏家族信件多次收发都是由其转递。1843年秋,六弟曾国华、九弟曾国荃进入长沙城南书院就读,九弟曾国荃曾多次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季弟曾国葆也曾肄业长沙岳麓书院,或参加科考。第二层次是湘乡县城,曾麟书、曾国潢父子曾多次在县城公干或拜访朋友,在这里居住期间有多次收发信件记录。第三个层次是在家,包括“白玉堂”“黄金堂”,后四弟曾国潢和季弟曾国葆搬出单独居住,但距离并不远,也可视作一个地点。依据笔者统计,由湖南寄往北京的86封信件注明在家所发的2封,在县城8封,在省城14

①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15页。

②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61页。

③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120页。

④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123页。

⑤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163、167、170、178页。

⑥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183页。

⑦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78、115、116、89页。

⑧ 黎庶昌、王定安等:《曾国藩年谱(附事略 荣哀录)》,第8—21页。

⑨ 张宏杰:《曾国藩的经济课》,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51页。

封,未注明的有62封;由北京到湖南的66封收信记录统计表明,在家收信43封,在县城收信4封,在省城收信15封,未注明的4封。

#### 四、曾国藩京官时期家庭通信效率评估

本文从信息损失度和发出-收到时间两个视角评估曾国藩“京官时期”的家庭通信效率。第一种通信效率测量方式——信息损失度指标,借鉴王泽军、赵国俊的研究,<sup>①</sup>计算公式如下:

$$\text{信息损失度} = \frac{\text{发出信息} - \text{接收信息}}{\text{发出信息}}$$

本文使用信件丢失率测量信息损失度。第二种通信效率测算方式和彭凯翔相同,使用通信时间,即信件发出到收到的时间(天数)。<sup>②</sup>

##### (一) 信件丢失率估算

1841年是曾国藩比较集中记录信件丢失的一年,后期明显减少,可能因为心理上已经接受故而记录减少。1841年四月十七日给祖父信中已提到,“澄侯弟三月初四在县城发信已经收到,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sup>③</sup>五月十八日写给父亲信第一次提到信件丢失,闰三月“十五日接四弟在涟滨所发信,系第二号,始知正月信已失矣”。<sup>④</sup>八月十七日写给父母信中提及,“王睢园处去冬有信去,至今无回信,殊不可解。”<sup>⑤</sup>十月十九日给父母信中提到,“七月廿五由黄恕皆处寄信、八月十三日由县附信寄折差,皆未收到。”<sup>⑥</sup>这一年根据曾国藩的记录可能收信14封,去除父亲归途4封,家庭通信可能只有10封左右,如果以损失3封计算,信件丢失率可能在23.1%;如果以损失4封计量,损失率在28.6%。这一年信件丢失率偏高可能原因如下:第一,曾国藩是时官位尚卑,在北京可以使用折差、提塘,但家人在湖南使用正规渠道通信比较困难,有附信寄折差丢失为证;第二,曾国藩此时社交圈子仍然有限,顺路捎带仍然局限于熟人圈子,例如同乡彭山屹,甚至还有会馆、商行等渠道,这些渠道相对于附书代递可信度尚低;第三,1841年国内处于鸦片战争期间,路途不靖,战火从南到北,各地军情奏折想必如雪花般入京,附书代递系统均想必极为忙乱、不堪重负。<sup>⑦</sup>之后数年也有几封丢失,1844年三月初八曾国藩接到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的六弟和九弟二月十五的信,信上说是第二号,可知第一号没有到。这封信借着这次事件说到,1843年湖南家中提及五月到十二月,发信七八封,回京之后,家人仅检出两封,一次是五月二十二日所发,一次是十月十六日所发,余皆不见。由此可见,1843年这一年收信丢失了至少5—6封,当然这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由于取件不及时导致的。1849年,正月初十给诸弟信中提到,“而温弟在河南托邹墨林转寄一信,则至今未到。澄弟十一月十九所发一信,亦至今未到也。”<sup>⑧</sup>五月十五日给诸弟信中也提到,“而正月十七日第一号至今未到,诚不可解。”<sup>⑨</sup>

1849年的“丢信风波”值得仔细回顾一下,可以此管窥传统社会通信过程的诸多问题。1849年二月初四曾国潢在家书中说:“正月十六七发信,着刘一送省城者,共二封。因欧阳家、邓星阶及曾厨子等各有信,作一封则太厚也。”<sup>⑩</sup>四月初八曾国潢又说:“家中正月十八发信一封,着刘一送省交萧

① 王泽军、赵国俊主编:《秘书工作实用全书》,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页。

② 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第31页。

③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3页。

④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4页。

⑤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10页。

⑥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13页。

⑦ 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一点。

⑧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158页。

⑨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169页。

⑩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47页。

新五者,书信共两函。”<sup>①</sup>闰四月廿六日曾国潢已经开始追查这封信了,“正月之两函,总之未到,实在闷气。弟前已三信查萧新五。萧本月之朔回信来,云其信两封,系亲自交提塘王二爷手,因官信太多,延住一月,现已发去,万不得失漏等语。弟拟此次信请陈家兄弟,又要呼萧前来核查,止要不失,迟到也可。”<sup>②</sup>七月十二日曾国潢信中又提及,“正月之两信,嘱两弟到省,定要查得水底石穿。倘他脸(笔者注:原文如此)再查不出此信,则归之乌有矣。”<sup>③</sup>曾国华七月二十二日信中也说道:“正月之信,弟与萧辛五在提塘及折差周维新家细查一翻,云实已交京提塘,大底信已失落,其词如此,亦无从究怨也。”<sup>④</sup>曾国荃七月初八日信中也有涉及,“正月之信,昨到省时即问萧辛五,渠至提塘讯王二。王二云实系交周维新。明日拟同萧找王二问周,如周承认,则询其究竟;如其不承,则拟将王二究责,庶几以后不至失落信件耳。”<sup>⑤</sup>曾国藩最早三月二十一日注意到这封信没到,四月十六日、五月十五日再次提及,六月初一给诸弟信中写了追查此信的复杂过程。<sup>⑥</sup>原文较长,不一一引用,提到的人物有陈岱云、萧莘五、周维新、韩折弁、张折弁,驻京提塘等多人。由此可见,信件丢失,追查起来非常艰难,可能曾国藩之前很少追查信件丢失。曾国藩后文解释说:“予因正月十六之信至为详细,且分为两封,故十分认真。”由此推测,他对于短信丢失可能并不在意。

《曾氏三代家书》提到信件丢失次数较少,曾麟书1848年六月初一信中说,“予于第二次信,已言写信太过,尔因未接到第二次信,遂数次辨明”。<sup>⑦</sup>1849年六月廿日信中说,“今年家中所发之信,独第一号尔未接到。”<sup>⑧</sup>这封信前文已经分析,不再赘述。综合统计,曾国藩京官时期明确丢失或者疑似丢失的信件可能有14封,这一时期曾国藩总共收到信件126封,信件丢失率可能在10%左右。毫无疑问,这种估算方法仍然存在诸多缺陷,但目前没有更多资料来完善估计。依据这一丢失率每年丢失信件在1—2封,而且可能还主要集中在京官时期的前期。1841年和1843年是丢失信件较多的年份,这两年可能也各有特殊情况。但从曾氏兄弟家书中可以明显感到,随着时间推移,信件丢失率明显下降了,1849年曾氏兄弟对一封家书的丢失如此小题大做可见一斑。我们认为信件丢失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北京到长沙越来越多使用折差、提塘附书代递,由长沙到家也依赖于家人家仆专递,降低了信件丢失率。第二,顺路捎带群体由同乡逐步过渡同僚、士子,后者可能行程更单一,抵御途中风险能力更强,且与曾氏兄弟同属一个圈层,有更多的互惠交换,更注重声誉。<sup>⑨</sup>

## (二) 通信时间回归

我们使用异方差稳健 OLS 估计方法来考察通信效率的影响因素。全样本回归的结果列示在表2中,湖南寄北京样本的回归结果列示在表3中。所有回归的被解释变量均为通信时间(信件发出到收到的天数)。核心解释变量我们考虑了年份、月份虚拟变量,收信或发信地虚拟变量,主要是湖南,分为三种:在家虚拟变量、县城虚拟变量和省城虚拟变量,传递方式虚拟变量则分为三种:顺路捎带虚拟变量、家人家仆专递虚拟变量和折差虚拟变量。需要指出的是,家人家仆虚拟变量只出现在北京寄湖南的情况中,因此表3的回归中去除了这一变量,而标注折差的信件较少。月份虚拟变量的基准组为一月,篇幅限制只报告了统计显著的,收信或发信地虚拟变量的基准组为未标注组,传递方式虚拟变量基准组也是未标注组。

①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53页。

②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55页。

③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64页。

④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119页。

⑤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145页。

⑥ 唐浩明编:《曾国藩家书》(上),第170页。

⑦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1页。

⑧ 曾麟书等著,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第4页。

⑨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这一部分的补充。

表 2 曾国藩京官时期家庭通信时间影响因素全样本回归结果表

	(1)	(2)	(3)	(4)	(5)	(6)	(7)	(8)
被解释变量	信件发出到收到的时间(天数)							
年份	-2.164*** (-3.50)		-2.261*** (-3.62)		-2.340*** (-4.25)			-2.140*** (-3.71)
三月虚拟变量		-6.126 (-1.30)	-7.718 (-1.58)		-10.290** (-2.07)			-10.177** (-2.05)
八月虚拟变量		-9.031* (-1.66)	-17.239*** (-3.24)		-17.474*** (-2.83)			-21.659*** (-2.81)
十一月虚拟变量		-5.631 (-1.24)	-9.770* (-1.75)		-10.225 (-1.57)			-9.904 (-1.59)
县城虚拟变量				-11.576** (-2.53)	-10.666** (-2.25)		-10.008** (-2.11)	-9.966** (-2.16)
在家虚拟变量				-4.520 (-0.88)	-4.542 (-1.09)		-3.598 (-0.73)	-4.275 (-0.99)
省城虚拟变量				-16.984*** (-4.68)	-21.565*** (-5.33)		-16.824*** (-4.76)	-21.158*** (-5.46)
顺路捎带虚拟变量						25.348 (1.58)	25.130 (1.61)	25.164 (1.57)
家人家仆专递虚拟变量						-12.866*** (-5.69)	-12.401*** (-3.79)	-10.514** (-2.54)
折差传递虚拟变量						1.182 (0.15)	2.966 (0.26)	3.193 (0.54)
其他月份控制变量	No	Yes	Yes	No	Yes	No	No	Yes
常数项	4039.885*** (3.53)	41.231*** (10.87)	4221.924*** (3.65)	46.742*** (17.23)	4373.496*** (4.29)	40.152*** (23.57)	45.174*** (15.51)	4002.742*** (3.75)
样本数	152	152	152	152	152	152	152	152
调整后的 R 平方	0.082	-0.004	0.085	0.058	0.184	0.072	0.130	0.255
F 值 (P 值)	12.219 (0.001)	1.184 (0.304)	2.565 (0.004)	7.825 (0.000)	3.764 (0.000)	12.565 (0.000)	8.458 (0.000)	4.008 (0.000)

说明: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的 t 统计量数值,\*\*\*、\*\*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节省篇幅,不显著的月份虚拟变量被省略。

表 2 回归结果显示:(1)伴随进京年份增加,家庭通信的平均时间每年缩短 2 天左右,而且这一结果统计上是显著的,且是稳健的,这可能是由于“学习效应”不断优化导致的。熟练使用折差、提塘等附书代递,越来越多使用家人家仆专递等高效手段可能需要不断摸索、优化,这些效应虽然下文进行了控制,但是由于数据测量并不充分,可能有许多效应仍然包含在年份变量中。(2)月份虚拟变量估计中只有八月份是稳健地,统计上显著地降低了通信时间,这可能与传统的交通方式有关系。<sup>①</sup>传统社会陆路交通并不安全,陆路行车时往往天大亮后才出发,天未暗之前已经投店,故而可能白天的时长会对行进速度有影响。而农历六、七月份虽然白日更长但天气炎热,可能也会限制行进速度。(3)收信地或发信地虚拟变量中,在家虚拟变量与未标注组差异不大,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大多数未标注组可能属于在家情况,而县城和省城的结果都是统计上显著的,稳健地降低了通信时间。这说明城市通信更为便利一些,通信效率更高。从家到县城、省城本身存在距离,可能会延长通信时间,但交通时间应小于回归系数差值。(4)传递方式虚拟变量中,顺路捎带组相比于未标注组显然是效率更低的,但是这一结果统计上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较小,这一组标注得比较少,折差传递的结果也是类似的,只有家人家仆专递这一组是统计上显著地、稳健地降低了通信时间,这与我们的

①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醒寄信的季节性可能对通信效率的影响。

理论推测也是一致的。整体而言,回归结果表明,影响家庭通信效率的核心因素可能主要是:熟练程度、季节性、居住的地点是否位于城市,以及家人家仆专递。

由于《曾氏三代家书》中整理出来的北京寄湖南信件主要分布在1848年之后,年份代表性更差一些,为了规避这种样本代表性不足带来的局限,我们使用湖南寄北京样本重新做了估计。表3中的结果可以视作一种稳健性检验,由于样本量缩减,再进一步控制月份虚拟变量将导致回归效率大幅降低,因此这里不再控制月份虚拟变量。研究结果整体上与前文表2回归较为类似。例如,随曾国藩进京年份的增加,家庭通信的平均时间每年缩短2天左右,而且这一结果统计上是显著的,且是稳健的;在省城寄信的通信效率显著高于其他组,而且这一结果统计上是显著的,稳健的。与前文不同的是,这里在县城寄信的通信效率与未标注组没有系统的差异,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虽然符号是负向的,但这一结果也是稳健的;同时,在家寄信的效率明显是更低的,需要更长的通信时间,这一结果是稳健的,统计上高度显著。从家到县城也需要时间,但是可能应小于回归结果。顺路捎带组比未标注组显然需要更长的时间。较为奇怪的是,折差传递组也是效率更低的,可能由于样本太少,导致结果较为随机,而且结果并不稳健。整体而言,传统社会通信效率显然更多取决于是否能够更多使用正规渠道附书代递和家人家仆专递,而顺路捎带的效率显著更低。即使像曾国藩这样的家族,居住在乡间的通信效率也是显著低于县城和省城,对于普通平民而言通信效率可能会更低,因为是时更多人居住在乡村,城市化程度较低,而且大多数人并不能够接近附书代递、家人家仆专递这类途径。可以对比的是彭凯翔依据《山西票号史料》对票号通信的研究,相较于曾氏家族通信,票号通信效率较高,且方差更小,但票号通信成本高昂,专人送信,还有奖励和惩罚机制,一封信脚价16两—26两之间。<sup>①</sup>这是曾国藩所无法承受的。

表3 曾国藩京官时期家庭通信北京寄湖南样本回归结果表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	信件发出到收到的时间(天数)					
年份	-1.787 ** (-2.36)		-2.126 ** (-2.55)			-2.013 ** (-2.26)
县城虚拟变量		-8.722 (-1.57)	-8.988 (-1.53)		-7.557 (-1.32)	-8.202 (-1.36)
在家虚拟变量		24.903 *** (8.53)	18.525 *** (2.65)		26.068 *** (8.45)	19.637 *** (2.72)
省城虚拟变量		-11.382 ** (-2.49)	-16.546 *** (-3.11)		-10.786 ** (-2.38)	-16.160 *** (-2.86)
顺路捎带 虚拟变量				17.925 ** (2.30)	16.068 * (1.97)	9.637 (0.98)
折差传递虚拟变量				4.425 (0.75)	7.961 (0.82)	9.248 * (1.76)
常数项	3345.921 ** (2.39)	48.097 *** (17.00)	3974.905 ** (2.58)	45.075 *** (19.14)	46.932 *** (15.66)	3764.467 ** (2.28)
样本数	86	86	86	86	86	86
调整后的R平方	0.075	0.057	0.163	0.011	0.065	0.215
F值 (P值)	5.552 (0.021)	67.623 (0.000)	10.214 (0.000)	2.754 (0.069)	41.927 (0.000)	8.02 (0.000)

说明: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的t统计量数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① 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第31—32页。

## 五、结论

通信效率是理解组织信息交互能力,进而理解社会组织和国家治理的重要钥匙。虽然既有文献对传统时代的通信有所涉及,但是通信效率评估却很罕见,更不用说对民间通信效率的评估。本文认为,传统社会的远距离民间通信活动主要是由士绅阶层完成的,且主要是在家族家庭内部,以报平安的安信为主,因此使用这类通信评估远距离民间通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曾氏家族资料保存状况更好,是较为理想的史料来源。本文以《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日记》和《曾氏三代家书》为核心史料,通过汇聚曾国藩京官时期的家庭通信记录,利用信件丢失率和发出-收到时间两个指标,系统地评估了曾国藩京官时期的家庭通信效率,为理解古代社会通信提供了一些证据。研究发现,曾国藩京官时期初期信件丢失率较高,1841年丢失率高达28.6%,信件丢失的最主要记录都是发生在进京初期,后期信件丢失率显著下降,京官时期整体信件丢失率估计为10%。虽然这一数据估计可能存在诸多缺陷,但可视作一种有益的尝试。信件丢失率下降的原因是曾氏家族逐步构建出了北京到长沙的附书代递,长沙到家的家人家仆专递系统,两种方式紧密衔接,有效规避了信件丢失的发生。发出-收到时间的计量回归结果表明,随曾国藩进京时间推移,更熟练和优化使用“附书代递+家人家仆专递”系统,通信效率提高,发信-收信地处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通信效率更高,附书代递效率高于顺路捎带。将上述结论推广到传统社会平民通信可能需要谨慎,因为平民通信频率、数量低而导致学习效应不足,优化程度低,平民通信效率应该更低。一个证据是1841年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的一个本家丹阁十叔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走了151天,另一个本家楚善叔写给曾国藩的信也耗时84天,远超平均水平。总而言之,虽然本文研究还有不少缺陷,但对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19世纪中期左右的晚清传统社会通信活动,进而社会组织方式会有所裨益。

### 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of

### Family Communication in Zeng Guofan's Period of Beijing Official

*Shi Lei, Fan Weijie, Yang Decai*

**Abstract:**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bility of organizations, and then the key to underst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researches on long-distance communication in traditional society, it seldom involves folk communication and less evaluates the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By gathering Zeng Guofan's family letter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Zeng Guofan's family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in the period of Beijing officials, and uses two indicators of letter loss rate and sending receiving time to evaluate the efficiency of folk communic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era. It is found that the loss rate of letters in Zeng Guofan's "period of Beijing official" is relatively high at the beginning, but it continues to decline in the later period.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from Beijing to Changsha, more formal system such as zhechai and titang are used, and from Changsha to home, more "family and domestic service" are used. The result of Zeng Guofan's "period of Beijing official" family communication time regression shows that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more skilled and optimized use, the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of Zeng's family is higher.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low efficiency of civilian communication in traditional society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low number of frequencies, the low degree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nability to be closer to the formal system, which may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organization mode of traditional society.

**Keywords:**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Zeng Guofan, Family Letters

(责任编辑:高超群)